

分道而行

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

A Parting of the Ways: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



同文馆

〔美〕迈克尔·弗里德曼 (Michael Friedman) 著
张卜天 译 南星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分道而行

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

A Parting of the Ways: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

〔美〕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 著
张卜天 译 南星 校

B505
F590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8-594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道而行：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美)迈克尔·弗里德曼著；张卜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同文馆·哲学)

ISBN 978-7-301-16443-3

I. 分… II. ①弗… ②张… III. 哲学史-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B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7338号

Copyright © 2000 by Carus Publishing Company

书 名：分道而行——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

著作责任者：〔美〕迈克尔·弗里德曼 著 张卜天 译 南 星 校

责任编辑：吴 敏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6443-3/B·087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印刷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1.25印张 136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纪念我的朋友戴维·伯顿
(David Burton, 1945—1975)

前 言

20 世纪思想界有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统治英语世界的“分析”哲学传统与统治欧洲的“大陆”哲学传统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或分裂。在许多人看来,前一传统似乎远离了令所有思想者挂怀的那些大的精神问题——生活的意义、人性的本质、好的社会的特征等等,转而沉迷于某些特定的技术问题,对语言进行逻辑或语言学分析。哲学在这里显得像是一门科学,特点是方法清晰,在“结果”的表述和吸收上能够协作性地、累积式地进步,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它完全脱离了没有被少数狭窄的专家所顾及的、一般人真正关心的核心哲学问题。于是,研究哲学的传统核心问题的任务就落在了大陆思想家身上。但在更具分析倾向的人看来,大陆思想家的著作似乎全然不顾方法的清晰以及协作性的、累积式的进步,而是故意或存心使用晦涩的语言,它更像是对语言的一种诗意运用,而不是逻辑的论证式的叙述。C. P. 斯诺曾经指出,在科学家的文化和“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这两种相互对抗(而且相互无法理解)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分裂,分析传统与大陆传统的分歧正是这种更为一般的分裂在专业哲学界的一种表达。

20 世纪 30 年代初,这种基本的思想分歧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鲁道夫·卡尔纳普针对“形而上学的伪句子”发起了众所周知的攻击。卡尔纳普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维也纳小组的一位领袖,他积极鼓吹对哲学采取新的科学研究方法,明言要与形而上学传统

彻底决裂。在论文《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克服形而上学》中，卡尔纳普特地挑出马丁·海德格尔作为当时形而上学的代表，集中考察了海德格尔那个臭名昭著的命题——“无本身无着”（Das Nichts selbst nichtet），并把它当做一种形而上学的伪句子的范例。在卡尔纳普看来，这种典型海德格尔式的命题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因为它违反了正确的语言逻辑结构。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样一种诊断当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而是源自对后来所谓分析传统的逻辑特征的错误迷恋。

在我们现在看来，卡尔纳普与海德格尔就“无本身无着”所产生的冲突或许有些荒谬：一方蹩脚地表达着貌似深奥、其实几乎无法理解的看法，另一方则学究式地将这种说法付诸似乎全然不当的逻辑审查。因此，很难看出它可能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开始写现在这本书时，我惊奇而兴奋地得知，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发起的论战与20世纪初哲学思想的一个广为人知的重要事件密切相关，那就是1929年海德格尔与恩斯特·卡西尔之间进行的著名的达沃斯辩论。因为事实表明，卡尔纳普出席了海德格尔与卡西尔的辩论，与海德格尔在达沃斯有过会面和交谈，而且在回到维也纳后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深感兴趣。接着，作为这一经历的余波，卡尔纳普写出并直接递交了《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克服形而上学》的初稿。那时正值30年代初，在动荡的政治气氛中，他正力图在欧洲找到一个教授职位。后来发生的情况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卡尔纳普的批判中的关键议题（
x 无论是对他还是海德格尔）都被赋予了社会和政治含义，反映了魏玛共和国晚期深刻而普遍的文化斗争。事实上，就在纳粹1933年掌权不久（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此间担任了弗莱堡大学校长，公开拥护新的纳粹政权），卡尔纳普和卡西尔都移民到了英语世界，海德格尔则是唯一留在大陆的活跃的一流哲学家。

我希望在本书中表明,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达沃斯的相遇对于我们理解随后产生的所谓分析哲学传统与欧陆哲学传统的分裂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这次相遇之前还没有这种分裂,至少在德语思想界是如此。逻辑经验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新康德主义以及海德格尔“生存论—解释学的”现象学变种其实都在经历一系列哲学交流和斗争,都在关注当时席卷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那些革命性变化。不同的哲学运动当然意见并不一致,彼此之间就这些革命性变化的解释和意义必定时有冲突,但它们仍然在讲同一种哲学语言,积极研究一些共同的哲学问题。不仅如此,既然达沃斯辩论本身关乎新康德主义的命运以及对康德哲学的恰当解释(海德格尔将与卡西尔关系紧密的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当作他的主要对象),我还希望表明,认真关注这三位哲学家的思想如何以不同方式由共同的新康德主义遗产沿着泾渭分明的方向发展,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看清楚分析/欧陆分野的本质和来源。

本书通过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性事件,呈现了 20 世纪普遍存在于分析哲学传统与欧陆哲学传统之间的分裂。通过从三位主人
xi
公的不同视角考察达沃斯的相遇,我希望能够获得一种特别有启发性的视角。特别是,我们将会看到,逐渐由卡西尔所阐明的相对而言不那么为人所熟知的哲学立场如何能被视为一种英雄之举,试图在越来越宽的鸿沟之间架设桥梁,鸿沟的一方是卡尔纳普所拥护的以科学为导向的哲学研究方法,另一方则是由海德格尔所代表的从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向来推进哲学的明确尝试。将卡西尔整合的尝试与卡尔纳普和海德格尔的近乎两极的立场相对照,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可能性和动力以做出类似的英雄之举。尽管卡西尔留下材料可能无法让我们满意,但是如果不能正确评价其深远而综合的哲学思想风格的力量和弱点,理解其哲学思想深刻的综合特征,很难想象我们会取得什么进展。

通过以这种方式关注三位特定的哲学家和一个特殊事件，我当然不妄图对分析/欧陆之分野的历史背景或哲学意义给出一种完备而全面的解释。要想完整地论述这一历史背景，显然需要更加关注后康德时代唯心论的发展，以及 19 世纪对它的重要反转，比如在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中。而要想完整地论述这种分裂的哲学意义，显然也需要包含比目前多得多的 20 世纪哲学家。事实上，即便是关于我所详细讨论的这三位哲学家，也仍然遗漏了许多重要的东西。比如就卡尔纳普来说，我特意强调了新康德主义对其思想的影响，而没有顾及来自维特根斯坦、罗素、经验论传统甚至莱布尼茨等人的其他种种影响。就海德格尔来说，我也强调了其思想的康德的和“先验的”维度，而略去了源自他对古希腊人解读的真正存在论的关切（“存在问题”）。通过强调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对卡尔纳普和海德格尔的影响，他们与卡西尔的比较也变得更为方便。

由于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达沃斯的相遇将哲学注意力（至少暂时）集中在新康德主义在 20 世纪初的命运，集中在对康德学说的正确阐释，特别是康德知性的逻辑能力与感性的想象能力之间的关系上，因此，我的目标是从这一串具体哲学问题出发，尽可能地说明分析/欧陆之分野。同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看似晦涩难解的哲学问题是如何与当时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最终导致了 1933 年的知识分子大移民，从而对我们的两大哲学传统（无论是语言上还是地理上）的隔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正如前面所说，我是在（从托马斯·于伯尔那里）得知卡尔纳普出席了达沃斯辩论之后，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做这项研究的。我当时写下的初稿内容大致是现在的一半，然后将它交给朋友和同事们审阅。同时，我还基于这一初稿在几所大学做过讲座，包括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西安大略大学、北伊利诺伊大学和

圣母大学。其间我从多位听众那里获得了宝贵建议,特别是 Sandra Bartky, Susan Cunningham, Theodore Kisiel 和 Lynn Joy。Peter Gordon 还就整个初稿提出了非常宝贵的书面意见。1996 年,名为“克服形而上学:卡尔纳普与海德格尔”的这份初稿的节略版发表于 R. Giere and A. Richardson, eds., *Origins of Logical Empiric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感谢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惠允在本书中重印这篇论文的大部分内容。90 年代中期,我在海沃福德学院、西北大学、匹兹堡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讲过该论文,同样要感谢那时给我提出意见的人,特别是 Kathleen Wright, Kenneth Seeskin, James Conant, John Haugeland, Hans Sluga 和 Richard Rorty。

xiii

关于卡西尔,我尤其要感谢 John Michael Krois。我和他于 1994 年结识,我从他本人关于卡西尔以及达沃斯辩论的工作中受益甚多,感谢他就本书上一稿所提出的建议。在完成这项研究(包括拿到卡西尔专门讨论逻辑实证主义的迄今尚未发表的手稿副本)的过程中,我自始至终受到他慷慨的鼓励。

特别感谢 André Carus,不仅是因为他鼓励我在 Open Court 出版公司出版本书,而且也因为他就本书上一稿所提出的极为详细和认真的评论,包括各种哲学的、结构的、文体的和语言方面的问题。我相信由于这些意见,本书已经得到大大改进;当然,这些方面余下的任何问题均由我负责,特别是在他的建议偶尔被我忽视的地方。

最后,感谢 Frederick Beiser, Graciela De Pierris, Gottfried Gabriel, Alison Laywine, Alan Richardson, Thomas Ricketts, Werner Sauer 和 Brigitte Uhlemann 所提出的意见、建议和技术帮助。感谢 Scott Tanona 制作了索引。

关于文本和译本的说明

所有从德文的翻译都是笔者本人译的。在引用时,我先是引用德文原版的页码,再在括号里注明参考书目中给出的英译本的相应页码。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德文本页码可以在英译本边缘处找到。在这些情况下,我只引用德文本页码。在引用康德著作(在参考书目中没有特别列出)时,我一般只引用相关著作的标题(或许也带上章节标题或其他子标题)。有个别提到《纯粹理性批判》的地方引用的是第一版(A版)和/或第二版(B版)的标准页码。

目 录

前 言	(1)
关于文本和译本的说明	(1)
第一章 相遇达沃斯	(1)
第二章 克服形而上学:卡尔纳普与海德格尔	(9)
第三章 新康德主义背景	(23)
第四章 海德格尔	(35)
第五章 卡尔纳普	(57)
第六章 卡西尔	(80)
第七章 逻辑与客观性:卡西尔与卡尔纳普	(103)
第八章 达沃斯前后:卡西尔与海德格尔	(119)
第九章 正确认识分析传统与欧陆传统	(135)
参考书目	(149)
索引	(157)
译后记	(165)

第一章 相遇达沃斯

1

达沃斯,瑞士;1929年3月17日至4月6日。瑞士、法国和德国政府资助了一门“国际大学课程”,显然旨在调和法语和德语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其最精彩的部分是卡西尔和海德格尔所作的一系列讲演以及两人随后的辩论。

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堪称当时德国的两位顶尖哲学家。卡西尔是当时最著名的康德学者,也是康德著作标准版的编者,他刚刚完成了一本巨著——《符号形式的哲学》;海德格尔则刚刚出版了《存在与时间》,正取代胡塞尔而成为现象学运动的领袖。在讲演以及随后的辩论中,海德格尔首先对《纯粹理性批判》作了一种激进的现象学一形而上学阐释,它与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明显冲突,而卡西尔则与马堡学派关系密切。难怪这一事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学生和教授。卡尔纳普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维也纳小组的代表人物。^[1]

海德格尔对康德的阐释旨在表明,《纯粹理性批判》并没有提出一种知识论,特别是,它并未提出一种关于数理自然科学知识的

2

[1] 感谢托马斯·于伯尔最先提醒我注意,卡尔纳普出席了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达沃斯的讲演和辩论。卡尔纳普在他的日记[ASP RC 025-73-03, entries from March 18 to April 5, 1929]中记录了这一特殊事件。

理论。《纯粹理性批判》的真正贡献在于，它第一次提出了为形而上学奠基的问题，即阐明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根据这种阐释，康德主张（与《存在与时间》的主要观点惊人地一致），形而上学只可能奠基于对有限的人类理性之本性的先天分析上。由于有限，人的理智（与神的理智不同）必然依赖于感性直观。而且，海德格尔的阐释中真正激进的地方在于，康德引入的所谓知性的先验图型（schematism）能够将感性与理智（知性）融于一种“共根”（common root），即先验想象力，其最终的基础（再次与《存在与时间》的观点显著一致）乃是时间性。这暗示，西方形而上学所植根的逻各斯、精神或理性的传统最终被明确摧毁了。^[2]

在随后的辩论中，卡西尔先是表示，对于先验想象力根本的重要性，他赞同海德格尔的意见（不过是按照卡西尔本人的符号形式哲学来解释的，[有限的]人被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但他强烈反对作为“符号动物”的我们便因此被限制在“无理性的”（arational）有限领域。康德本人已经表明，有限的人可以从有限中解脱出来，进入客观有效的、永恒必然的真理的领域，无论是在道德经验上还是在数理科学上。基于此，卡西尔问海德格尔是否真想否认这种客观性，坚持一切真理都是相对于此在（Dasein，具体而有限的人）的。海德格尔承认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他仍然否认可以进入一个本质上非有限的领域。相反，哲学的真正使命——以及我们的真正自由——恰恰在于抛弃这些传统的幻觉，信守我们本质的有限性（我们“严酷的命运”[hard fate]）。

[2] 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Heidegger, 1929a]中发表了这一阐释，这本书是他在达沃斯大学课程结束后的几周写就的。在[Heidegger, 1991]中，这部著作还附有几篇附录，包含了海德格尔为其达沃斯讲演所作的笔记以及由O. 博尔诺夫和J. 里特准备的关于卡西尔—海德格尔辩论的规程。对这些材料的翻译可见于[Heidegger, 1990]。

对海德格尔而言,与卡西尔在达沃斯交流看法是一次重要机遇。通过与当时新康德派“理性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直接交锋,他可以宣称自己便是那种全新哲学的缔造者,这种哲学注定要取代新康德主义传统的霸权,同时也会取代胡塞尔现象学中残余的“理性主义”倾向。^[3]通过对《纯粹理性批判》本身作一种彻底“反理性主义”解读,海德格尔达到了这一目的。最后,鉴于两人在年龄和职业阶段上的差别(卡西尔 55 岁,海德格尔还不到 40 岁;卡西尔从 1919 年起就在汉堡大学任哲学教授,海德格尔直到当年才接任胡塞尔在弗莱堡大学的职位),这次相遇包含了因时代变迁而引起的各种戏剧性场面。事实上,似乎是海德格尔赢得了达沃斯那些年轻学生的支持。^[4]无论如何,海德格尔对新康德主义传统“理性主义”的反叛在整个欧洲大陆以及其他地区无疑会大获成功。

现在想来,也可以从相遇达沃斯看出一种社会政治的维度。卡西尔不仅是当时德国古典自由思想传统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也是现代政治共和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出生在一个四处漂泊的犹太家庭,在马堡学派的创始人赫尔曼·柯亨(第一个在德国获得教授职位的犹太人,进步社会主义政治的著名拥护者)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从 1906 年到 1919 年,卡西尔在柏林大学任私俸讲师,在那些年里,尽管他产出惊人(包括他的[1906]、[1907a]和[1910],以及对莱布尼茨和康德著作的编辑),但仍然没能获得一个正规教职。1919 年春,新成立的法兰克福大学和汉堡大学终

[3] 比较海德格尔的“Zur Geschichte des philosophischen Lehrstuhles seit 1866,” reprinted as Appendix VI to [Heidegger, 1991]。

[4] 关于目击者的评述,参见 L. 恩莱特的报导,重印于 [Schneeberger, 1962, pp. 1—6]; [Pos, 1949] 以及 [T. Cassirer, 1981], 其相关的部分重印于 [Schneeberger, 1962, pp. 7—9]。亦参见 [Krois, 1992], [Aubenque, et. al., 1992] 和 [Kaegi and Rudolph, 2000]。

于决定授予卡西尔教授职位，卡西尔为此真心感谢魏玛共和国。在汉堡大学富有成果地工作了十年之后（特别是在那里完成了《符号形式的哲学》），卡西尔于1928年8月在大学庆祝魏玛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活动上为魏玛做了辩护。通常认为，魏玛共和国有些“非德国”（un-German）味道，但卡西尔却认为[1929a]，共和政体的观念其实起源于德国哲学传统。接着，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11月，卡西尔担任了汉堡大学校长，他是第一个在德国担任此职的犹太人。当然，到了1933年，一切都改变了，卡西尔被迫移民。他在英国牛津待了两年，在瑞典哥德堡大学待了六年，此后一直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直到1945年去世。^[5]

海德格尔的社会和政治轨迹几乎就是卡西尔的翻版。他出生在西南天主教区一个小镇的中产阶级下层家庭，起初打算学神学，成为神职人员。然而在弗莱堡学习期间，海德格尔受到了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所谓西南学派）以及胡塞尔现象学越来越多的影响。从一开始，他在哲学上的才华便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1916年，胡塞尔从哥廷根来到弗莱堡。在获得博士学位和教师资格（在李凯尔特指导下）之后，海德格尔留在弗莱堡担任胡塞尔的助手。1923年至1928年，海德格尔在马堡任副教授，之后成功转到弗莱堡成为胡塞尔的继任者。当然，海德格尔并不支持魏玛共和国。希特勒1933年上台时，海德格尔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正式加入纳粹党，并且在当年5月臭名昭著的大学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歌颂新的政治运动的胜利[Heidegger, 1933]。尽管海德格尔对纳粹政权似乎越来越不抱幻

[5] 参见[Krois, 1987]，它不仅包含传记材料和思想史内容，还对卡西尔的哲学作了极为清晰和有益的分析。[Paetzold, 1995]也对卡西尔的思想历程作了非常清晰可读的论述。[Schwemmer, 1997]对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卡西尔哲学作了出色的讨论。关于卡西尔传记的主要资料有[Gawronsky, 1949]，[Pos, 1949]和[T. Cassirer, 1981]。

想,十个月后即离职,但在1935年完成、1953年发表的著名讲演集《形而上学导论》中,他仍然认为德国是将西方从苏联共产主义以及美国技术民主中拯救出来的最后希望,并且振振有词地谈及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6〕

然而,从1929年的达沃斯辩论中,或者更一般地,从海德格尔与卡西尔的关系中解读出一种戏剧性的政治冲突是错误的。因为首先,达沃斯辩论似乎是在一种极为友善而平等的气氛中进行的。〔7〕其次,无论是在达沃斯辩论之前还是之后,几乎直到海德格尔1933年任校长之前,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一直关系良好,相互敬重。《存在与时间》的一个著名脚注〔Heidegger, 1927, p. 51〕简要评论了《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二卷,并暗示了两人1923年在海德格尔一次讲演上的会面,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两人就海德格尔当时描述的那种“此在的生存论分析”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类似地,卡西尔在《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三卷的五个脚注中对海德格尔表示赞许〔Cassirer, 1929b, pp. 173n, 189n, 193n, 200n, 218n (pp. 149n,

6

〔6〕关于传记材料,参见〔Ott, 1988〕和〔Safranski, 1994〕。〔Farias, 1987〕激起了近来对海德格尔政治纠葛的兴趣,但它的论述不够公允。“内在真理和伟大”这一著名说法出现在〔Heidegger, 1953, p. 152 (p. 166)〕。〔Sluga, 1993〕对海德格尔的政治作了特别有趣的讨论,它将海德格尔的政治纠葛置于当时其他德国哲学家的情境下来考察。

〔7〕参见P. Aubenque的〔Aubenque, *et. al.*, 1992〕以及〔Schneberger, 1962〕中收录的L. 恩莱特的报导。〔T. Cassirer, 1981〕和〔Pos, 1949〕所描述的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辩论并不那么友好和平等,前者甚至暗示了海德格尔反纳粹的证据。然而,由于这些报导是在战后带着事后的眼光写成的,在我看来(特别是考虑到卡西尔与海德格尔在达沃斯前后的良好关系),它们并没有多大意义。恩莱特的报导是在1929年达沃斯国际课程结束时写的,它提到了海德格尔与卡西尔之间的“平起平坐”与“归并”,以及当卡西尔身体暂时不太舒服时,海德格尔不太情愿地宣读了他本人的讲演内容,然后亲自向卡西尔报告内容〔Schneberger, 1962, p. 3〕。然而,最近J. M. 克鲁瓦最近的工作却表明,就在达沃斯大学课程之前三周,由于右翼理论家O. 施潘针对柯亨和卡西尔对康德的解释在慕尼黑大学(由于希特勒的参与而陷入带有国际社会主义背景)公然挑起的反犹攻击,这次会面也许存在着一种较为阴暗的(但未经言明的)潜在情绪:参见〔Krois 2000〕。

163n, 167n, 173n, 188n)]。不仅如此,两人还分别以恭敬之心针对彼此的著作写了批判性的评论:Heidegger[1928]评论了[Cassirer, 1925]; Cassirer, [1931]评论了[Heidegger, 1929a]。最后,在达沃斯相遇后,卡西尔与海德格尔一起访问了弗莱堡,并应邀发表讲演。卡西尔称,出席这次讲演的人多得出奇,第二天早上,他发现海德格尔“非常开诚布公,坦率而友好”。^[8] 于是,尽管两人从未就其巨大的哲学分歧的细节真正达成妥协^[9],但是(至少在 1933 年之前),社会或政治分歧显然并未影响他们的互相尊敬和欣赏。^[10]

目睹了达沃斯辩论的卡尔纳普似乎同样被这种既平等又热烈的哲学气氛所感染。特别是,海德格尔显然给卡尔纳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最早报告说[ASP RC 025-73-03, 1929 年 3 月 18 日]:“大学课程。卡西尔讲得很好,但有些理想主义……海德格尔严肃而客观[sachlich],相当有吸引力。”接着,卡尔纳普报告了他

[8] Letter from Cassirer to his wife, quoted in[T. Cassirer, 1981, p. 184](also in [Schneeberger, 1962, p. 9]). 这封信没有注明日期。然而, [T. Cassirer, 1981, pp. 181—189] 一直(错误地)将达沃斯辩论定位于 1931 年,于是我们知道卡西尔的弗莱堡讲演介于当时和 1933 年之间。由于卡西尔在信中提到“围绕着[Heidegger] 的疯狂谣言”,他对弗莱堡的访问似乎是在这一时期的相当晚的时候。

[9] 海德格尔计划作出评论[Cassirer, 1929b],但从未完成。在注释 8 中引用的给 T. Cassirer 的信中,卡西尔报告说:“[海德格尔] 向我承认,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对我的第三卷作出评论,但暂时不知道如何掌握它。”卡西尔从未在发表的著作中对《存在与时间》提出批评。然而在 1928 年,他在《符号形式的哲学》第四卷的草稿中对它作了讨论,正是这部著作奠定了卡西尔思想在当时哲学舞台上的地位。这一卷从未发表,卡西尔发表的是《当前哲学中的“精神”与“生活”》[Cassirer, 1930a]。批评《存在与时间》的 1928 年手稿显然与《当前哲学中的“精神”与“生活”》密切相关。它连同英译本最先发表在[Krois, 1983]; 亦参见[Krois, 1995], [Krois and Verene, 1996]。(在后面的注释 191 中,我还会简要地回到这一手稿。)

[10] 卡西尔知道海德格尔 1933 年出任校长的纳粹行为:参见[T. Cassirer, 1981, p. 183](reprinted in[Schneeberger, 1962, p. 8])。然而, [Cassirer, 1946, pp. 292—293] 没有谈及这一点,而只是称海德格尔(以及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创造了这样一种哲学,它“的确削弱并慢慢破坏了本可以抵抗住现代政治神话[即法西斯主义] 的力量”。